

炎帝祭祀述略

高强 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 教授

中国人素有“慎终追远”、“法祖敬宗”的传统，祖先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的价值取向之一。《管子·侈靡》云：“敬祖祢，尊始也。”《礼记·丧服小记》云：“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祢也。”《史记·礼书》云：“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祭祀是头等大事，祭祖是祖先崇拜的具体表现。《国语·鲁语上》曰：“夫祀，国之大节也。”《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语·楚语下》曰：“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中国人“对于祖先的崇敬，可谓达于极点”^[1]，以至于许多海外学者都认为，“祖先崇拜虽未列为中国的正式宗教，实则已成为中国宗教信仰和礼仪的主体”^[2]。作为中华人文始祖之一的炎帝，自然成为祭祖的主要对象之一。

一、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炎帝祭祀

对炎帝的祭祀由来已久。宝鸡民间传说炎帝误尝断肠草不幸牺牲后，黄帝曾专程赶到宝鸡天台山祭拜，埋葬炎帝的天台山，又被称作



神农大殿远景

“嘉陵”、“蟠冢”^[3]。《路史·后纪》说：“黄帝所崇炎之祠于陈”，罗苹注：“黄帝所崇疑在陈仓，故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祠炎帝。”《史记·封禅书》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吴阳即位于今宝鸡市陈仓区的吴山之南。《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克商后“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这些神农之后祭祀神农亦在情理之中。

《周礼·春官·小宗伯》载：“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炎帝与其它四帝一起被祭祀。

先秦时期炎帝祭祀的资料很少，且支离破碎，但将为数不多的

碎片连缀起来，仍然可以窥其大概。先秦时期的炎帝祭祀包括祖先祭祀、农神祭祀和五方帝祭祀等形式，其中祖先祭祀可能在炎帝族及其后裔中延续了很长时间，到周代逐渐扩展到各地各族，而五方帝祭祀见于《周礼》，其礼当形成于周代以前。^[4]先秦时期的炎帝祭祀开创了后世郊祭、庙祭、陵祭、先农坛祭之先河。

秦朝继承了秦国的祭祀传统，炎帝继续得到崇祀。刘邦入关后曾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汉书·郊祀志》）赤帝即炎帝，证明秦朝祭祀炎帝。汉



湖南炎帝陵碑

高祖刘邦为了宣扬以汉代秦的合法性，编造了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实际上是把炎帝尊为感生帝。刘邦在秦时四方帝祭祀的基础上增加了黑帝，形成了完整的五方帝祭祀系统。汉文帝对五帝祭祀尤为热衷。《史记·封禅书》载：“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祠以五牢具。”

《史记·孝文本纪》载：“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汉文帝“尚赤”，说明炎帝在五帝系统中地位重要。汉武帝封禅时在“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史记·封禅书》）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时再度借助赤帝子

的故事，声称汉为火德，遂为汉兴以来聚讼不休的德运之争划上了句号。汉代不仅郊祀祭天时同时祭祀包括炎帝在内的五帝，而且每逢立夏之日也要郊祭炎帝。《后汉书》载：“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汉代重视农耕，汉文帝曾昭告天下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史记·孝文本纪》）《汉旧仪》

曰：“春始东耕于籍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每逢籍田之日，皇帝都要先祭神农，然后再躬耕籍田，此习一直延续至清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继承了汉代的祭祀传统，对炎帝的祭祀主要表现为祭天随祀、明堂祭祀、迎气之祀和先农坛祭。南郊祭天是天子地位和王朝统治的象征，《魏书·僭晋司马叡列传》载王敦欲篡位，其属下问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王敦说：“尚未南郊，何为天子！”南郊之重要性可见一斑。魏晋南北朝是分裂割据时期，每个政权的统治者为了争夺正统地位，都要举行郊天大典，同时祭祀包括炎帝在内的五帝。

明堂祭祀是一种古老的祭祀形式，炎帝是祭祀对象之一。晋武帝、宋孝武帝、齐高祖、梁武帝等均祭五帝于明堂，以有功德之君配祀。炎帝祭祀还体现在籍田活动中。《晋书·礼记》载：“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始耕祠先农”，诏曰：“夫国之事，在祀与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天下。近世以来，耕籍止于数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于是乘舆御木辂以耕，以太牢祀先农”。宋、齐、梁、陈各朝亦行籍田之礼，设先农坛祭炎帝。

北周统治者宇文氏自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周书·文帝纪》），故而北周对炎帝祭祀尤为重视。孝闵帝祠圆丘时诏曰：“予本自神农，其于二丘，宜作厥主。”（《周书·孝闵帝纪》）北周祭礼中“圆丘则以其先神农配昊天上帝于其上”（《隋书·礼仪志》）。



宝鸡炎帝陵祭祀



炎帝陵午门

二、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炎帝祭祀

隋文帝、隋炀帝都举行过隆重的郊祭、明堂祭、五方帝祭和先农坛祭。《通志·礼略》载：“隋文帝受命，再岁冬至日，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五方上帝，天子并从祀。”隋代在长安南郊籍田，祭祀炎帝神农氏。

唐代继续在郊祭、明堂祭、五方帝祭和先农坛祭时祭祀炎帝，并且增加了三皇庙祭。据《大唐开元礼》卷一载：“凡国有大祀、中祀、小祀，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祇、神州宗庙皆为大祀。”于圆丘祀昊天上帝时，要以五方上帝和五帝从祀。立夏时皇帝祀赤帝于南郊。

唐初改在东郊籍田。《旧唐书·礼仪志》载：“太宗贞观三年（629）正月，亲祭先农，躬耕耒耜，籍于千亩之甸。”武则天时，改籍田坛为先农坛。唐代在国都立

三皇庙，开创了帝王庙祭。《唐会要》载：“天宝六岁（747）正月十一日，敕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殷祀，宜有钦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农，以祝融配；黄帝，以风后、力牧配。”

宋代不仅继承了前代的郊祭、明堂祭、五方帝祭、先农坛祭和三皇庙祭等礼仪，而且还增加了对炎帝的陵祭。宋太祖赵匡胤“定国运以火德王，色尚赤”（《宋史·太祖本纪》），尊崇炎帝为感生帝，故而有宋一代特别重视炎帝祭祀。赵匡胤派人遍访古帝王陵墓，但就是找不到炎帝陵。后来“太祖抚运，梦感见帝，于是驰节觅

求，得诸南方”（《路史·后纪》）。乾德五年（967），宋太祖下诏建湖南酃县炎帝陵，禁止樵采，置守陵五户管理陵殿，并遣员外郎丁顾言诣潭州（长沙郡）祭告。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宋孝宗“诏衡州葺炎帝陵庙”（《宋史·孝宗本纪》）。

宋代的籍田之礼始于雍熙四年（987），宋太宗“始诏以来年正月择日有事于东郊，行籍田礼”（《宋史·礼志》）。宋代还设四方蜡坛，行大蜡之礼，“东西以日月为主，各以神农、后稷配；南北皆以神农为主，以后稷配。”（《宋史·礼志》）

与北宋长期并立，由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人和女真人建立的辽、金



炎帝墓碑

政权亦尊崇和祭祀炎帝。《辽史·世表》：“庖羲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盖从周书。”辽统治者自称炎帝后裔，对炎帝的尊崇自不待言。金统治者虽未自称炎帝之后，但对包括炎帝在内的历代帝王却非常尊重，三年一祭，“祭伏羲于陈州，神农于亳州，轩辕于坊州……”（《金史·礼志》）

继宋之后统一中国的元朝保留了对炎帝的祭祀。元代的先农之祀始于忽必烈改国号为元的第二年，即至元九年（1272）。《元史·祭祀志》载：“十四年二月戊辰，祀先农东郊。十五年二月戊午，祀先农，以蒙古胄子代耕籍田。二十一年二月丁亥，又命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祀先农于籍田。”元代的三皇之祭始于“元贞元年，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太皞伏羲氏以句芒氏之神配，炎帝神农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轩辕黄帝氏以风后氏、力牧氏之神配。”（《元史·祭祀志》）

明朝祭祀炎帝的主要形式为陵祭、庙祭、殿祭和先农坛祭。明太祖朱元璋“釐正祀典，凡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类皆为革除。”（《明史·礼志》）圆丘祭天以五帝配食、明堂祭祀以五帝配祭、五方帝祭祀和蜡祭神农氏等古老祭礼均被革除，炎帝陵祭、三皇庙祭、先农坛祭得到继承。

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建先农坛于南京南郊，亲祭先农，以后稷配，行耕籍礼。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遣国史院编修雷燧赴湖南炎帝陵告即位致祭。有明一代除建文帝外，其余诸帝皆派遣官员赴炎帝陵祭祀。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仿南京制建先农坛。明初每年由顺天府尹致祭先农坛，后凡

历代帝王，正殿七室，中室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康熙二十四年（1685），规建传心殿，正中祀皇师伏羲、神农、轩辕，传心殿祭自此始。乾隆六年（1741），亲祭传心殿，六十年归政，再行之。

清朝从顺治十一年（1654）起开始祭祀先农，行耕籍礼。康熙皇



炎帝陵炎帝塑像

遇皇帝登极之初则亲祭。弘治元年（1488）定耕籍礼，每年皇帝都要亲耕籍田，祭祀先农。

清朝统治者汉化程度很高，康熙、乾隆等清帝熟读经典，饱览诗书，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因此对包括炎帝在内的中国历代圣贤明君颇为尊崇。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祭祀制度，对炎帝的崇祀有增无减，主要形式有陵祭、庙祭、传心殿祭和先农坛祭，其中陵祭次数之多，历代王朝无出其右。

清顺治二年（1645）开始庙祭

帝行耕籍礼，飨先农坛。雍正祭先农，行耕籍，规定各省及府州县卫皆设先农坛及籍田。乾隆三年，帝初行耕籍礼，先期六日，幸丰泽园演耕，届日飨先农，行四推。乾隆三十七年（1772），已62岁的乾隆皇帝不顾群臣反对，亲行耕籍礼，致祭先农坛。此后，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帝均祭先农坛。

三、辛亥革命以后的炎帝祭祀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

治，也终结了在中国存在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与此同时，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祭祀炎帝的制度也发生重大变化，对炎帝的庙祭、殿祭、先农坛祭等停止，对炎帝的陵祭活动也暂时中断。中华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政府都无暇祭炎，这本身就是中国国力衰微、中华民族危机的一个缩影。民国时期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炎帝陵祭，有案可稽的是1940年10月10日湖南省政府举行的祭祀活动。时值全面抗战时期，日军进犯湖南，湖南军民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的指挥下，先后进行了两次长沙会战，击退日军。为了防范日军的再次进攻，薛岳决定将湖南省政府暂时迁往酃县炎陵山。在筹建省府住所的过程中，主事人见炎帝陵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便报请薛岳批准，省政府拨专款修葺炎帝陵。远在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子超）得知重修炎帝陵的消息后，特地拨专款在炎陵山植树造林，薛岳亲自命名其为“林子超先生纪念林”，并撰写了《重修炎帝陵记》，建亭立碑，以示纪念。

1940年10月10日“双十节”（中华民国国庆日）这一天，薛岳特遣湖南省政府秘书长李扬敬率各厅主要负责人，专程前往炎帝陵致祭。酃县县长肖坤率地方乡绅迎接，上千群众闻讯赶来观看。上午10时左右，鼓乐齐鸣，铙声震天，当司仪宣布全体肃立，祭礼开始时，主祭官、陪祭官就位，礼官引领身着长袍马褂的主祭官李扬敬缓

步进入行礼亭，行隆重的三献礼，上香敬酒叩首后，代薛岳恭读祭文。礼毕之后，沿袭以前的做法，将刻好的《重修炎帝陵记》石碑竖立在碑亭内。随后李扬敬等人在肖坤及众乡绅的陪同下，参观了炎帝陵、奉圣寺。此次祭祀活动在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人们普遍认为，祭祀炎帝级别之高，礼仪之隆，此为民国以来之最^[5]。

1955年初，湖南炎帝陵因香客失火，造成主殿和行礼亭全部被焚，剩余建筑也在十年浩劫中被当作“四旧”全部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近三十年里，政府对炎帝的祭祀活动几近于无，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完全停止，究其原因，主要是受极左思潮的冲击，“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成为解决内外问题的不二法门。在阶级斗争的话语系统里，没有炎黄文化的位置，作为炎黄文化一部分的炎帝祭祀自然与其它传统资源一样受到冷落，甚至被当作“四旧”扫除。



炎帝陵炎帝塑像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与此相适应，中央开始拨乱反正，重新重视包括炎黄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资源，炎帝祭祀再度兴起。1993年，湖南炎帝陵修复工程竣工，并举行首次由省政府主持的公祭典礼。几乎与此同时，陕西宝鸡炎帝陵、炎帝祠也宣告落成，并举行首次公祭典礼。此后湖南炎帝陵、宝鸡炎帝陵以及湖北随州、山西高平等地的祭祀炎帝活动连绵不断，日益隆重。除政府主持进行的炎帝祭祀外，各地民间也有祭炎活动，每年都有大批海内外炎黄子孙到各地的炎帝陵、祠、庙祭祀炎帝，表达他们对炎帝的崇敬之

情。

当代炎帝祭祀热是国家重视、地方重视、民众重视、学者重视的产物^[6]。中央政府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对全球化的浪潮，需要利用炎帝文化等传统资源来激发国人的民族精神；地方政府希望借助炎帝文化来提升本地的文化品位，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招商引资，促进本地旅游业的发展；广大民众需要通过炎帝祭祀来“慎终追远”、“法祖敬宗”，满足自身的情感需要和信仰需要；专家学者需要通过炎帝祭祀来考察炎帝文化，进而考察炎帝文化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

余 论

古代的炎帝祭祀时间绵长、地域广阔、形式多样；清末的炎帝祭祀几近荒废；民国时期的炎帝祭祀时有时无；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炎帝祭祀完全停止；改革开放以来的炎帝祭祀备受重视。炎帝祭祀嬗变的历史折射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荣辱兴衰，研究炎帝祭祀，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和中华文化的生成、特质。

炎帝祭祀说明炎帝中华人文始祖的形象深入人心。虽然炎帝祭祀有时因为种种原因而暂时沉寂，但总体来看，从古至今绵延不绝，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究其根源，盖因炎帝中华人文始祖的形象已经定格在海内外华人的记忆之中，已经深深植根于海内外华人的内心之中，炎帝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海内外华人对炎帝的祭祀如同对黄帝的祭祀一样，是对中华民

族的认同，是对中华文化的礼赞。

炎帝祭祀是对开拓创新、为民谋利、自我牺牲、和谐统一的炎帝精神的弘扬。炎帝不辞辛劳，培育粟谷，发明耒耜，教民农作，为民谋利。炎帝不畏牺牲，始尝百草，和药济人，一日而遇七十毒，最终毒发身亡。炎帝顾全大局，与黄帝结盟，为华夏族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炎帝早已逝去，但炎帝精神却世代流传，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炎帝祭祀正是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

炎帝祭祀是文化寻根、文化自觉的需要，是凝聚民族、整合国家的需要。文化寻根“是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是处在文化变迁加剧时代的人，如何在传统与现代、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冲突背景中确认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是牵涉到我们这个星球和人类的互动以及人类内部互动关系的终极关怀问题。”^[7]“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8]。在一个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共同记忆”至关重要，而炎帝正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符号之一，对炎帝的祭祀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强化。

由此可见，炎帝祭祀至今仍有积极作用，不可随意否定。我们应该有选择、有扬弃的传承炎帝祭祀，逐步淡化其血缘色彩，强化其文化认同；淡化其官方色彩，强化其民间形式，将其凝聚中华民族的

作用发扬光大，从而促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 [1]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46页。
- [2] 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75页。
- [3] 参见《炎帝·姜炎文化》，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175页。
- [4] 曲英杰：《炎黄汇典·祭祀卷》前言，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页。
- [5] 参见谭建勋：《抗战时期湖南省政府祭祀炎帝陵前后记略》，《神州第一陵》，湖南省新闻出版局，1992年。
- [6] 参见高强：《炎黄子孙称谓的源流与意蕴》，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25页。
- [7] 叶舒宪：《文化寻根的学术意义与思想意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6期。
- [8]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炎黄文化研究》第10期。